

中國工運史料

4

1958

中國工運史料

1958年 第4期

內部刊物
注意保存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職工運動史研究室編
工人出版社出版

中國工運史料

1958年第4期

*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編

工人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東四牌市大街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1958年11月30日出版

印数：1—4,700册

定价：0.60元

目 录

陈达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 朱学范 (1)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 (1925年)

开会紀事	(14)
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报告 (节略)	(17)
关于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报告的決議	(18)
太平洋运输工人會議报告	(18)
关于太平洋运输工人會議报告的決議	(18)
汉堡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人大会报告	(19)
关于汉堡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人大会报告的決議	(30)
全国铁路总工会与赤色职工国际之关系报告及決議	(31)
工人阶级与中国现状之报告及決議	(32)
本会目前进行方針报告及決議	(33)
各路代表的报告	(35)
各路議決案	(47)
全国铁路总工会簡章	(49)
宣傳問題決議案	(54)
合作社問題的決議案	(55)
救济死伤及失业問題決議	(55)
审查“二七”救济委员会撫恤款項問題決議	(56)
会費征收及支配問題決議案	(57)
关于工賊問題的決議	(57)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閉会詞	(57)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58)

工人周刊

第28号：1922年2月5日出版 (60)

第29号：1922年2月12日出版 (78)

第57期：1922年12月17日出版 (95)

第63期（五一特刊号）：1923年5月1日出版 (110)

第64期：1923年5月23日出版 (121)

本刊資料，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陈达研究中国劳工問題的 立場、觀點和方法

朱学范

在反右派斗争中，右派分子陈达在政治上的反动言行，已经大量揭露，并予以有力批判了。他的反动活动和言论的特点，是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自称“一向不问政治”，以“超政治”、“纯学术”的姿态出现的，因而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他的反动学术思想在国内、国外散布很广，对于我国革命运动，特别在解放前的知识分子中间，曾经发生过一些消极的腐蚀作用。因此，对于他的反动学术思想作进一步的批判，肃清他在我国学术思想界的残余思想影响，还是有必要的。

陈达在去年鸣放时期，曾被右派分子费孝通等捧出来，作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一面旗帜。他数十年来以研究中国劳工问题和人口问题自豪，自称为实证社会学者。在劳工问题方面，他贩卖英、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在人口问题方面，他宣扬新马尔萨斯主义。本文只准备对于他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一些初步批判。

任何人研究劳工问题，由于阶级立场不同，就有不同的任务和目的。资产阶级学者如英国的韦伯和美国的康門司等研究劳工问题，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为了帮助资本家想办法，如何更加有效地加强对于工人的剥削，以便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帮助资产阶级政府想办法，如何更加有效地加强对于工人运动的压制，以便巩固资产

階級的統治。無產階級的導師馬克思和列寧以及他們的戰友和學生們研究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工問題，是為了指導工人階級如何更加有效地反抗資本家的剝削，如何從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下爭取徹底的解放，以便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超階級地研究勞工問題是不可能的，在歷史上也是不存在的。

陳達研究中國勞工問題，數十年來始終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表面上主張為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條件爭取局部的改良，實質上是企圖引誘工人階級迷失鬥爭的方向，為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服務。

什麼思想支配着他始終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呢？他認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动力，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資產階級。他在隨筆中說，不論那一民族或社會，對於富強或進步最有關係的是以下三個階級，即“政治階級”、“軍事階級”、“知識階級”^①且不說他對於階級的劃分方法多麼荒謬，只須指出他所用的三個階級名稱，實質上指的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

儒家思想對他也有一定影響。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在他的勞工問題理論中就成為“資產階級治人，無產階級治于人”。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他為勞工階級所下的定義，他說：“社會里有一部分人要終身受雇於資本家，靠工資來謀生的，這就是勞工階級。”^②意思就是說，不是工人養肥了資本家，而是資本家養活了工人；而且工人要終身做資本家的牛馬，永世不得翻身。

毛主席在三十年前就教導我們：“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却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先進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③但是，陳達在解放八年以後，頭腦中還是充塞着資產階級思想，頑固不化地無視無產階級的先進性，他說，“無產階級並不懂太多的科學知識，文化很低，怎能說是最先進的階級呢？”^④他始終不承認工人

① 陳達著“浪迹十年”，第238頁。

② 陳達著“中國勞工問題”，第250頁。

③ 毛澤東選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第一卷，第8頁。

④ “勞動”：“撕碎章羅聯盟復辟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旗幟”，1957年第19期，第2頁。

階級的先進性，不承認工人階級在現代社會發展中應有的領導地位和偉大作用。

在這種反動思想支配下，他一生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學術活動，就是宣揚英、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反對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為資本家的剝削行為和國民黨反動統治辯護，仇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

陳達開始研究中國勞工問題，就是為美國政府服務的。他在留美期間，曾受到美國勞工部統計局局長的“多方獎誘”，為該局出版的機關刊物“勞工月刊”撰寫中國勞工問題方面的文字。^①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結束的時候，他曾接受美國國務院的委託，調查中國各地的勞工狀況。^②解放以後，他還在大學的講台上繼續散布英、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毒素^③

他對於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一向懷有從階級本能發出來的惡感。同英美資產階級學者拉斯基等人一樣，把蘇聯的民主集中制誣蔑為“寡頭政治”。他在三十年代曾游歷過蘇聯，但並不是去研究蘇聯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經驗，而是抱著懷疑態度對待蘇聯的一切新鮮事物。直到解放以後八年之久，他還懷疑“為什麼蘇聯工會和政府是一個立場。”^④

陳達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為國民黨反動政府策劃欺騙中國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辦法。國民黨反動派在“四·一二”事變以後，一方面在全國各地施行白色恐怖政策，屠殺工人領袖，破壞工人組織，另一方面企圖利用英、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來欺騙工人群眾，緩和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在這種情況下，陳達就拋出了他的代表作“中國勞工問題”一書。從這本書中已可充分反映出他對於中國勞工問題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體系。他不僅在思想戰線上阻礙

① 陳達著“中國勞工問題”的序言。

② 呂文遠：“不容陳達的‘勞工問題’和‘社會調查’復辟”，人民日報1957年9月21日第7版。

③ 王勝泉：“陳達教了我些什麼”，見“勞動”1957年第19期第7頁。

④ 陳達1957年1月在民盟座談會上的發言，見“勞動”1957年第19期第6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而且積極參加國民黨反动政府的勞工立法工作。他為了宣揚國民黨反动政府所頒布的工廠法，曾在“中國工商管理協會和外籍僱主協會的贊助和合作”下^①，在上海進行了一次中外工廠的調查工作。他在調查報告中，除了宣揚國民黨反动政府的“德政”外，就是處處為資本家的利益着想，作了資本家的代言人。

陳達是一貫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會運動的。毛主席和劉少奇等同志在安源建立的工會，在當時被稱為“中國的小莫斯科”。當全國各地工會運動因“二七”大罷工失敗而遭到嚴重打擊時，安源工會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如中流砥柱，沒有遭到絲毫損失，因而又有“世外桃源”之稱。陳達對於這種富於革命鬥爭精神的工會是十分仇視的，長期以來加以無恥誣蔑。^②他在我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看到全國工會運動實際上處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就提出獨立工會運動的主張，他說，“勞工應該脫離黨和過激主義”，因為近年來“共產主義宣傳有害於勞工事業”。^③在“四·一二”事變後，他興奮地說：“左派失勢，勞工會左傾勢，將更受打擊無疑”。^④接着，他就幫助國民黨反动政府制訂工會法，企圖限制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進行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強迫他們服從國民黨反动政府的法西斯統治。當中國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革命勝利以後，進行着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時候，他還在大學的講台上散布在中國已經證明破了產的英國韋伯關於工會運動的謬論，企圖使中國工會運動獨立起來，脫離黨的領導。在反右派鬥爭中，工會系統出現了一批像高元等等的右派分子，他們都主張工會不要黨的領導。在這一點上，他們同陳達數十年來一貫倡導的工會獨立運動，在思想上是有深遠的淵源的。

① 陳達著“我國工廠法的施行問題”的引言，1931年中國工商管理協會發行。

② 陳達著“中國勞工運動的研究”，晨報副刊，1927年8月8日；

陳達著“國內戰爭時期的中國勞工”，美國“勞工月刊”1930年7月份，第17頁；

陳達：“工會主義與我國勞工運動”，偽中央日報1942年10月21日。

③ 陳達著“中國勞工運動”，“國際勞工局”出版的“國際勞工評論”，1927年3月份，第363頁。

④ 陳達著“中國勞工問題”，第107頁。

二

陈达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研究中国劳工問題，就不可能采用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一貫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理論，販賣欺騙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思想。

为了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理論，他企圖首先否定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說，因为他知道剩余价值学說是階級斗争理論的基础。他販賣資產階級經濟学者关于生产四要素的謬論，認為“生产的四种要素为資本、土地、管理及劳工，社会財富的發生，这四种要素都有功劳，所以对于每种須有相当的报酬。”^①依他看来，資本家在生产中剝削得来的利潤，同工人所得到的工資同样公平合理，这样也就无所谓資本家剝削工人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也就不会發生階級利益的冲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發出的一个划时代的宣言中指出：“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底历史都是階級斗争的历史。”^②陈达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發展，却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根本不承認階級斗争貫穿在全部階級社会的历史。歪曲历史事实的真相，企圖掩盖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敌对关系，以模糊工人群众的階級意識，这是資產階級学者一慣使用的慣技，其目的是要使工人群众在政治上永远处于蒙昧状态，以巩固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

我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陈达也不得不在鉄的事实面前承認，“劳資間的斗争日益加强”，^③但是，他并不承認社会發展必須通过階級斗争这一客观規律来实现，而提出“劳資須有相当調和方法”，企圖用調和階級矛盾的办法，来保持剝削制度下的“工业和平”，企圖使工人階級失去对于革命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信心，以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制度早日实现。

① 陈达著“中国劳工問題”，第250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8頁。

③ 陈达著“中国劳工状况”，見“美国劳工月刊”，1924年11月份，第45頁。

陈达所能接受的劳资斗争，只局限于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就是工界只管替自己謀切身的利益”，“單就向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等方面努力。”^① 如果說，他也承認工人要进行政治斗争的話，那也只限于进行議會斗争或立法斗争。他竭力主張“避免不健全的行動”，^② 他坚决反对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无情的阶级斗争，以致劳资間的关系大为紧张。”^③ 实际上，他害怕实现无产阶级專政，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建立过激派政权”，他感到这样会动摇资产阶级的統治地位，再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动摇中国社会的安宁”。^④

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重要而有效的斗争形式之一，就是工人罢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工人罢工作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在上一世紀四十年代研究英国工人运动时就着重指出，“罢工是工人的軍事学校，他們就在这里受到訓練，准备投入已經不可避免的偉大的斗争中去”。^⑤ 列宁更进一步發揮了这一思想，指出了罢工的深刻意义，他說：“罢工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質，它意味着工人阶级反对这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开端。”又說：“罢工是使资本家可怕，因为它开始动摇资本家的統治。”^⑥

陈达深知工人罢工对于资产阶级統治的严重威胁，因此，他在研究中国劳工問題时，首先就着眼于工人罢工問題。但是他研究中国工人的罢工問題，显然不是为了如何加强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而是为了設法緩和劳资間的冲突。他是坚决反对工人罢工的，他說，“罢工行为，实于社会利益有妨害”，他認為，“举凡和资本家捣乱，在社会里發生暴动种种情事，理应充份抑制才是。”^⑦

① 陈达著“中国劳工問題”，第576——577頁。

② 陈达著“中国劳工运动”，見“国际劳工評論”1927年3月份，第363頁。

③ 陈达著“国内战争时期的中国劳工”，見美国劳工統計局出版的“劳工月刊”，1930年7月份，第14頁。

④ 陈达著：“中国工厂立法”，見“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評論”，英文版，1932年1月份，第508頁。

⑤ 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文版，第275頁。

⑥ 列宁著“論罢工”，見“列宁論劳动”一書第205頁、第206頁。

⑦ 陈达著“中国劳工問題”，第568頁、第577頁。

如何来抑制中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呢？他认为可用国家法律来剥夺工人的罢工权利。如果发生工人暴动，就用军警武装力量加以残酷镇压。他说，“工人罢工，只能和平集会，不能暴动，不能威胁，不能和政府对抗。政府所以用武力的原故，完全是为维持治安或执行法律，所以遇必要时，可以未经人民允许或给予赔偿而剥夺人民的生命自由，或收用人民的财产。”①

陈达在劳工立法方面主张取消1924年工会条例所规定的工人罢工权利。他推荐资本主义国家所惯用的手法，即通过强迫仲裁限制工人的罢工权利，剥夺工人阶级手中最重要的斗争武器。他这种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建议”，颇得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赏识。用来压制工人运动的1928年劳资争议处理法和1929年的工会法，都具体体现出这种反动透顶的阴谋。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曾利用这些法律，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罢工行动加以无比残酷的镇压。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从来没有放下这一斗争武器，而是用轰轰烈烈的罢工行动，打退了反动统治者的凶恶进攻，同时也粉碎了陈达这一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反动理论。

陈达贩卖英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企图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他劝告资本家在工资待遇方面作一些微小的让步，他说，“工人如嫌工资不足，他们必设法使经济改善，假使不达目的，就要闹出工业不安现象，如争议和罢工等，结果雇主们还是要受经济的损失。”②他要求资本家对待工人如对待机器一样，必须经常进行修理，他说，“福利是给工人们修理身体的机会”，“福利的设施，是帮助增加生产，同时改良劳资的关系。”③他也主张提倡劳工教育，但不是为了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而是为了“便与资方合作，改善劳资感情，及增加生产”。④所

① 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第523页。

② 同上书，第370页。

③ 同上书，第501页。

④ 陈达著“我国工厂法的施行问题”，第22页。

有这些諸如此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义办法，无非是用来模糊工人群众的階級意識，引起他們对于資本主义制度的幻想，緩和日益尖銳的階級斗争，維護資產階級統治下的剝削制度。

陈达一方面要求資本家給工人們一点小恩小惠，打扮成工人的恩人一样；另一方面，他要求工人維護“工业和平”和“社会安全”。他不但反对工人用暴力进行政治斗争，甚至想使工人放弃經濟斗争，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要“減輕生存竞争”。为什么連經濟斗争都是不必要的呢？他認為“工人的进款增加，奢侈的習慣跟着發現，生活往往不及改良，况且劳工供給因受刺激而增加，生殖率因此提高，社会痛苦因此产生。”^①

面对着中国工会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有很快發展，他又对中国工会的組織原則射出一支毒箭。他一貫反对按产业組織工会的列宁主义原則，这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決議和1924年工会条例所早經肯定了的原則。他竭力主張按照职业原則組織工会，他說，“这种工会和我国旧有的行会相似，所以往往受一般人欢迎。”^② 其实际意义，就是要把工人的职业利益放在階級利益之上。

陈达的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思想，同国内、国外各种各样的反动学說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傳入中国以后，引起当时反动統治者和資產階級的極大恐慌。資產階級右派知識分子代表胡适，企圖用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改良主义学說来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傳播。陈达数十年来正是按照胡适所提出来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的主張，一貫运用資產階級社会学的理論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劳工問題和人口問題，并通过这些問題的研究，向馬克思列宁主义爭夺思想陣地。

陈达一向贊賞英国費边社的資產階級改良主义学說，特別欽佩韋伯在劳工問題方面的理論。解放后，他还在大学的講台上把韋伯推崇备至，称他为“英国工人运动的理論权威”。^③ 大家都知道，韋伯是費边

① 陈达著“中国劳工問題”，第582頁。

② 同上書，第109頁。

③ “劳动”：1957年第19期，第7頁。

社的創始人之一，他繼承了孔德和斯賓塞所創立的實證社會學，站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前列。列寧在“英國的和平主義與英國的不愛理論”一文中曾經正確地指出，恩格斯鄙視這伙資產階級騙子韋伯之流，因為他們想腐化工人，想在反革命的意義上影響工人。

陳達是在美國資產階級教育中培養出來的中國資產階級社會學者。他曾先後留學麗德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但在勞工問題方面，受惠司康新學派的影响較深。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康門司。陳達在他所著“中國勞工問題”一書中，即一再引述這一學派的基本論點。書中勞工法規這一章的第一節，就是康門司所著“勞工立法原理”一書第一章的節譯。他在該書結論中論述工人方面解決勞工問題的标准時，又根據康門司所著“工業管理”一書中的論點，認為“工界的主要目的，是雇傭的保障”。^①我們知道，康門司就在這裡接着大肆攻擊馬克思學說和社會主義運動，企圖否定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理論。他說：“我們調查所得的明顯事實，是管理的重要性。資本主義并不如馬克思所想象的那樣，像自然的盲目力量在運動，我們看到，它是按照管理的意志在運動。”^②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理論，是根據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研究得出來的無可辯駁的結論。資產階級學者為了要駁倒馬克思的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只好首先加以歪曲然後再加以攻擊，最後是洋洋得意地自以為駁倒了馬克思主義。這是自欺欺人的騙局，同學術上的爭辯是毫無共同之點的。陳達所販賣的就是這批貨色。

陳達販賣英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學說有三、四十年之久，並沒有收到什麼顯著效果。在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上，根本不適宜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改良主義的生長。由於我國工人階級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輝照耀下，團結全國人民取得了革命鬥爭的偉大勝利，陳達從海外移殖到我國來的這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野草，也就不得不宣告夭折了。

① 陳達著“中國勞工問題”，第576頁。

② 康門司著“工業管理”，第269頁。

三

陈达贩卖的既然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在研究中国劳工问题时就不可能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他武断地说，中国劳工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①。他早在我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说，“劳工的主要愿望，应该是工人的社会经济方面的改良，因为他们今天的痛苦，基本上是由于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②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仍说：“工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比在政治方面考虑得更多。”^③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痛苦的根源难道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吗？但他力图避开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问题，尽力缩小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方面的重大意义。

他在研究1918年到1926年间中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时，脱离了当时中国工人运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流，而陷于形式主义的数字游戏。根据他对于我国九年来罢工原因的统计分析，由于生活上的经济压迫占47.24%，由于工作上的待遇问题占22.96%，而由于群众运动仅占16.07%，^④这样不就证实了他关于中国劳工问题性质的论点了吗？后来，他在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劳工问题时，也是运用同样的手法，来证实当时中国劳工问题仍然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尽量缩小当时工人罢工的政治意义。^⑤

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政

① 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第576页。

② 陈达著“中国劳工运动”，见“国际劳工评论”1927年3月份，第363页。

③ 陈达著“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问题”，见“美国社会学杂志”1947年11月份，第191页。

④ 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第240—241页。

⑤ 陈达著“上海的劳资争议与罢工”（1937年—194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6期。

治斗争。陈达并不否认，“在国内各要市宣布大规模罢工”，^①但在他分析当时中国罢工问题的文章中，虽然充满着统计数字，并列举了许多罢工事例，对于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却只字未提。为什么要抹煞这一重大政治斗争呢？是因为“受新潮影响或受人利用的罢工”，“难得实在证据”吗？^②当然，“实在证据”并不是那么难得的。在他自己整理的“八年罢工总表”中^③，仅上海工人参加五四爱国罢工运动的，即有三、四十个项目，难道其中没有一个“实在证据”吗？可见，问题不在于“难得实在证据”，而是由于他已意识到当时“全国已处于社会革命的边缘”，^④而又不肯抓住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日益高涨的这一主流。当然，中国工人阶级走向革命的道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改良主义就没有前途。这就是陈达为什么要片面地、表面地歪曲中国劳工问题的本质的真实原因。

陈达为了宣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德政”，狂妄地歪曲历史事实，并伪造虚假的统计数字，企图证实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动政权统治下的生活得到大大改善。

他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的农工政策，他认为“孙中山关于中国工人福利的社会学说，得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热烈拥护。”^⑤他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伪宪法是政治上的一大骗局，他认为“国民党期望工人在促进民主中发生作用。”^⑥他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工厂法是欺骗工人的工具，他认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一种“高贵精神”，“企图通过订立工厂法发生重大的社会改良”。^⑦他不承认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日益恶化，他认为“国民党和国民

① 陈达著“劳工运动”，见“中国劳工问题”一书的附录，第604页。

② 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第154页。

③ 陈达著“近八年来国内罢工的分析”，见“清华学报”，1926年6月份。

④ 陈达著“国内战争时期的中国劳工”，见美国“劳工月刊”1930年7月份，第9页。

⑤ 陈达著“中国政府的劳工政策及其对于工业和劳工的影响”，“国际劳工评论”1949年1月份，第35页。

⑥ 同上注，第51页。

⑦ 陈达著“中国工厂立法”，见“中国社会政治评论”1932年1月份，第554页。

政府不断改进人民的经济社会生活”。^①

陈达用什么方法来证实他的反动透顶的荒谬论点呢？英国诗人卡莱尔说过，资产阶级的“统计是轎車”，陈达就駕上了这架轎車，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他心里想去的地方了。他为了要证明工人生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有很大改善，就利用了1946年他在上海所作劳工调查的统计资料。调查报告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描写上海工人的工资状况，最后一个结论是，战后上海工人的真实工资比战前1936年增加到三倍以上。真是一个駭人听闻的奇迹！

凡是生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的人们，都会深刻地体验到，中国广大人民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日益艰苦，特别是抗战时期的上海工人，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动统治者对外发表的装饰门面的官方统计，也无法掩盖这一铁的事实。^② 战后第一年上海产业工人的真实工资指数，根据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方统计，也不过比战前水平高出半倍左右，^③ 而陈达所编的指数却比战前水平增加两倍以上。^④ 这样，不是正可证明国民党反动政府爱护工人的“德政”了吗？不是正好誣蔑上海工人阶级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迫害斗争毫无意义了吗？

陈达究竟用什么方法创造出这种奇迹来的呢？资产阶级学者伪造真实工资指数的一般方法，不外是尽量抬高实在收入指数和尽量压低工人生活费指数。陈达就是运用这种方法，来达到他虚构工人生活有很大改善的假像的目的的。

陈达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方法，是在资产阶级实证社会学的指导下，根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精神，利用资产阶级统计方法，歪曲中国劳工问题的真相，虚构出不符实际情况的假像，以便宣扬资产阶级改

① 陈达著“国内战争时期的中国劳工”，见美国“劳工月刊”1930年7月份，第25页。

② 1941年上海工人真实工资仅相当于1937年的27%，见“国际劳工局”的“国际劳工年鉴”1947—1948年，第130页。

③ 伪社会部所编的指数为151.3%，见“各重要市县工资指数”1946年8月份，第6页。

④ 陈达所编的指数为315.2%，见1946年上海市伪社会局出版的“上海工厂劳工统计”，第22页，解放后又發表在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1967年第4期。